

# 传统宗族文化对创业活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247个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洪洲

(广西大学经济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城市创业活力在正式制度缺位的背景下仍然表现出强劲韧性,其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传统宗族文化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宗族文化为切入点,选取2003—2020年的24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传统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族文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力,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存在鲜明的异质性:在我国东部和南方城市影响显著,而在其他区域不明显;对于高等级城市与低等级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且对高等级城市影响强于低等级城市。机制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内核中的教育观念能够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影响城市创业活力;宗族文化内核中的守信观念能够通过改善城市信用环境影响城市创业活力;宗族关系网络能够通过拓宽城市民间借贷影响城市创业活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应辩证加强宗族文化传承,弘扬宗族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发掘其重视教育和诚信互助等观念和社会资本的潜在价值,提升城市经济活力。

**[关键词]**宗族文化 传统文化 文化内核 关系网络 创业活力

**[中图分类号]** G122; F2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6)03-0084-12

## 一、引言

城市创业是驱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sup>[1]</sup>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截至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已提高至92.3%。在城市创业主体中,民营企业无疑是我国创业的主力军。但在国有部门几乎垄断金融、土地等关键要素的正式配置渠道,而民营

企业难以充分获取的背景下,普通居民创业面临多重约束:自有资金不足、融资困难;技术、管理与合规知识匮乏;市场信息获取渠道狭窄;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等。然而据统计,2013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城市创业并未衰减,反而持续攀升。那么,在正式制度缺位情况下,究竟是何种力量支撑了城市创业的韧性?关于此问题,现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资本、家族治理模式和地方政府需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降低

收稿日期:2025-05-27;修回日期:2025-08-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部湾城市群结圈的文化动力机制研究”(72163002);2024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城市文化多样性对居民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YCSW2024038)

作者简介:张洪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

企业交易成本和融资约束、家族治理能够降低其内部监督成本、政府为实现辖区GDP和就业率等政绩目标为企业发展提供隐性支持体系从而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sup>[2-3][4](P138-156)</sup>

作为中华文明赓续数千年的精神根脉,传统文化已深植于我国社会结构与价值谱系,是影响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变量。但现有研究缺乏从传统文化视角对城市创业发展进行系统性解释。特别是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数据表明,全国民营企业中85.4%为家族企业,这意味着宗族文化很可能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不降反升现象具有重要且尚未被系统揭示的解释力。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宗族文化并未随乡土社会瓦解而式微<sup>[5]</sup>,反而借助农民进城和城市扩张吸纳周边农村等机遇<sup>[6]</sup>,推动宗族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愈发紧密。已有研究表明在法律、金融等正式制度供给不足时,宗族在民营企业融资借贷、订单获取、风险分担及纠纷解决等环节发挥了替代性功能,从而有望对城市整体经济活力构成重要支撑。

基于此,本文拟以宗族文化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使用1990年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对2009年《中国家谱总目》里所记录的中国各城市家谱数量进行标准化以衡量宗族文化强度,以城市每万人口新创企业数量测度城市创业活力,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城市创业活力的相关研究。现有学者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研究普遍聚焦于知识产权保护、银行业发展水平、地方税务等正式制度因素<sup>[7-9]</sup>,本文以宗族文化为切入点,揭示其对于城市创业活力影响,从而为非正式制度影响城市创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第二,丰富了宗族文化在当代经济社会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宗族的影响研究大都聚焦于农民和家族企业<sup>[10-11]</sup>,本文

研究从宏观层面,将宗族与城市创业活动联系起来,分析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第三,本文研究对以往宗族文化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拓展。不同于以往研究关注宗族文化对微观主体的影响<sup>[12-13]</sup>,本文从宏观层面剖析宗族文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从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改善城市信用环境和拓宽城市民间借贷三个渠道,对宗族文化的作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分析。

## 二、文献综述

### (一) 宗族与宗族文化

地区经济发展与地区文化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一直是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地区文化愈发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sup>[14]</sup>同时,从文化特性的角度来说,文化对经济影响是非常持久的。<sup>[15]</sup>宗族起源于先秦时期,历经朝代更迭,经久不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sup>[16](P22-26)</sup>宗族文化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sup>[17]</sup>在传统小农社会背景下,宗族以血缘为纽带将族人紧密联结,形成“聚族而居、同姓为宗”的姓氏组织,并以祠堂、族谱等为物质依托,对内提供互助与救济,对外进行经济交往与社会互动。

已有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并非仅具象征意义,而是作为非正式制度深度嵌入区域经济运行之中,在正式制度缺位时形成有效补充。例如,在农村地区,宗族组织可以作为社会互助组织,带动农户外出务工从而降低村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升农户金融机构信用评级以及降低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等积极经济影响。<sup>[10,18-19]</sup>在企业经营方面,当地企业可以借助宗族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信息,弥补并购时的信息劣势,促进企业进行并购决策<sup>[11]</sup>;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提供管理激励,并减轻财政限制从而促进企业产生更大的创新

产出<sup>[20]</sup>；通过增进信任，促进信息交流以及道德规范这三条路径显著缓解家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sup>[61]</sup>。此外，孙程九基于省级层面的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公共品提供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地区长期经济发展。<sup>[21]</sup>但现有研究较少将宗族文化与城市经济发展联系。

## （二）宗族文化与城市创业活力

创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助推器”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十分关注的课题。学者们围绕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正式制度，从知识产权保护、银行业发展水平、地方税务、市场准入及国家试点政策等角度探讨其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sup>[7-9,22]</sup>随着城市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一些学者也关注到数字要素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从公共数据和政府数据的公开和获取到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研究数字化水平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sup>[23-25]</sup>以上研究普遍聚焦于城市正式制度，但较少关注文化或非正式制度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事实上，文化与创业具有密切联系，对于创业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和经济决策等具有显著影响。<sup>[15,26]</sup>现有文献揭示了宗族文化与创业之间存在多重关联，但研究对象以农民和流动人口为主。在农村地区，同姓宗族网络能够转化为非正式资金渠道，凭借血缘信用提供非正规信贷，有效缓解创业融资约束。<sup>[27]</sup>同时，宗族文化有利于提升农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助推农民创业。<sup>[28]</sup>此外，在农民创业阶段，宗族文化能够有效提升农民技术创新水平和正规化程度。<sup>[29]</sup>在流动人口创业方面，相关研究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影响社会融入，降低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与意愿<sup>[30]</sup>；而迁出地宗族文化通过家乡社会网络和构建社会信任模式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sup>[31]</sup>。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创业活动，从而对城市整体创业活力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尝试从多维度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并深入研究宗族文化对于农民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创业影响。然而，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还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其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掘。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历经数千年社会变迁与文明演进，宗族文化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可以从宗族文化内核和宗族关系网络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宗族文化内核是一套经世代传递并内化于宗族成员的价值体系，以家国情怀、遵纪守法、崇文重教等为核心理念；而宗族关系网络是宗族成员受文化影响的外延表现，凭借血缘—地缘纽带形成非正式制度网络，用以实现宗族成员间的信息共享、风险共担与民间融资。本文基于以上两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宗族文化内核中教育观念和守信观念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和信用环境效应，以及宗族关系网络影响下的民间融资效应，剖析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 （一）宗族文化内核与城市创业活力

宗族文化包含了积极的“礼治”教育，推崇孝亲敬长、读书治学、勤俭持家、好善乐施、胸怀天下等中国优秀传统美德。而“族规”或“家规”等具有民间法特征的宗族内部规范和惩戒机制，融合了法治和德治的双重属性，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实现宗族与国家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彰显了宗族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宗族的教育理念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其核心观念不仅体现在重视族人教育，更将“学而优则仕”的功名追求嵌入宗族血脉。在宋代和明清时期，各地宗族大力发展教育，设置学田、族田和义田资助族人完成学业，助力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进而跨越到士绅阶级。清代徽

州宗族创办的书院、私塾多达数百所,有些地区甚至做到“一村一家,亦各有其书屋”。<sup>[32]</sup>因此,在宗族文化影响下宗族成员重视教育,有助于地区教育氛围的形成,进而促进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sup>[33](P10-22)</sup>,对地方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也具有深远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促进城市创新能力<sup>[34]</sup>,且高素质人才队伍有助于提升城市创业存活率和品质。因此,本文认为宗族文化越浓厚的城市,对教育重视程度越高,能够有效提升地方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宗族文化历来重视道德对成员行为的指导作用。宗族成员的交往以宗族信用为背书,族内人员在与其他宗族进行社会活动时会更加信守诺言以维护本宗族的声誉。<sup>[6]</sup>宗族内部具备熟人社会的典型特质,具有有效的信息传播和信任机制,一旦成员存在失信行为,将在群体中传播,进而社会网络中成为失信人员,最终导致在宗族中难以立足。宗族文化对于成员信用的塑造在从商领域更加凸显,劝诫宗族内部经商者应诚实守信,重诺轻利,如蒋氏家训“从商者诚信第一,货真价实”和贺氏家训“为商者,要诚信,为富者,要济贫”。因此,在宗族兴盛或宗族文化强度越强的地方,居民会更加注重自身信用水平,从而营造良好的城市商业信用环境。城市商业信用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提高交易履约力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而有利于提升城市创业活力。<sup>[35-36]</sup>

## (二) 宗族关系网络与城市创业活力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sup>[16](P13-17)</sup>,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社会交往总是存在着某种信任边界,人们往往认为那些处于特定群体内部的人比群体外部的人更值得信赖<sup>[37](P28-42)</sup>,而血缘联系是中国人际关系网络中最为亲近、紧密的一环。宗族文化会加强宗族成员间的社会联系,加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和构建宗族关系网络,

形成社会资本。

由于传统银行借贷对抵押物、信用记录及规模门槛的严格要求,普通创业者往往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充足资金支持,关系网络成为其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途径。<sup>[38]</sup>宗族成员间的信任促进了民间借贷等经济活动在宗族内部的开展<sup>[39]</sup>,降低由于信任不足而带来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其内部成员间进行融资借贷。对于绝大多数新创企业而言,创业活动周期较长,初期创业收益较少,资金短缺是初创企业面临的核心难题。<sup>[40]</sup>通过宗族成员间的民间借贷缓解融资约束,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现金流,尤其有利于解决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难题,降低资金风险<sup>[41]</sup>,进而保障创业计划的顺利实施。因此,本文认为宗族文化越浓厚的城市,宗族关系网络越强,普通宗族成员创业越可能从中获取民间借贷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如图1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以下假设:

H1: 宗族文化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H2: 宗族文化通过改善城市信用环境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H3: 宗族文化通过拓宽城市民间借贷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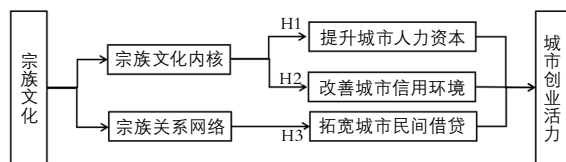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 四、研究设计

###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的宗族文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为了检验其影响,采用双向固定模型,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Enterp_{it} = \beta_0 + \beta_1 Clan_i + \gamma Controls_{it} + Province + Time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代表城市,  $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Enterp_{it}$ 表示 $i$ 城市在第 $t$ 年时的创业活力;解释变量  $Clan_i$ 表示 $i$ 城市基于1990年户籍人口数量标准化的宗族文化强度;控制变量  $Controls_{it}$ 表示 $i$ 城市第 $t$ 年时一系列城市层面可能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变量。同时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e$ 和时间固定效应  $Time$ 以期望控制省份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城市创业活力产生的影响和排除宏观上的时间趋势。 $\beta_0$ 为常数项,  $\varepsilon_{it}$ 为模型回归残差项,  $\beta_1$ 为本文所关注的核心系数,用于反映传统宗族文化强度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 (二) 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

本文选取247个城市2003—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传统宗族文化对于所在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本文选取城市创业活力为被解释变量,其数据来源于天眼查的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宗族文化强度为解释变量,其数据来源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中的族谱数据。本文选取城市城镇化率、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科研投入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数据。

#### 1. 被解释变量

参考何雨可等<sup>[42]</sup>和白俊红<sup>[43]</sup>等的研究方法,以城市户籍人口数作为标准化基数,以城市每万人中新创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具体做法为本文以天眼查为数据查找平台,从中获取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根据企业注册时间、地理位置和所属行业等关键信息,将企业数据准确匹配到对应的城市,进而得到城市年份新创企业数量面板数据。参考白俊红的研究方法,利用每万人新创企业数量构建关于城市创业活力的面板数据。<sup>[43]</sup>

$$Enterp_{it} = \frac{i \text{市} t \text{年新创企业数量}}{\text{城市户籍人口数量(万人)}} \quad (2)$$

应当说明的是,采用城市户籍人口数量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企业规模差异而产生的测量误差。

#### 2. 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中,关于宗族文化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大姓人口占区域人口百分比衡量<sup>[30]</sup>,侧重于衡量宗族文化分布的广泛性;另一种则是通过区域人口的族谱密度测度<sup>[6, 13]</sup>。家谱是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着宗族世系繁衍、重要人物事迹和家族发展轨迹等信息,利用族谱密度进行测量,能够反映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反映地方宗族文化影响力。<sup>[44]</sup>本文侧重于研究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的影响,故采用族谱密度衡量宗族文化。具体做法为借鉴刘冲等的方法,利用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里所记录的中国家谱数据,通过筛选整理可以明确族谱所在地的各城市家谱数量,得到各城市所拥有的家谱数量数据。<sup>[45]</sup>1990年人口流动还较少<sup>[6]</sup>,使用1990年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对家谱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地区的宗族文化强度,从而得到每万人口宗族文化数据。

$$Clan_i = \frac{i \text{市族谱数量}}{1990 \text{年城市户籍人口数量(万人)}} \quad (3)$$

####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做法,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发展水平  $Urban$ ,用城镇化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Inhgdp$ ,用城市人均GDP加1取对数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lnbuild$ ,用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加1取对数衡量;财政支出水平  $lngfina$ ,采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1取对数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lnfina$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加1取对数衡量;科研投入水平  $lntech$ ,采用全市科学技术支出加1取对数衡量;教育发展水平  $lneduc$ ,采用普通中小学学生数量加1取对数衡量。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ntrep	4373	97.610	102.321	1.980	1398.221
Clan	4373	0.457	0.973	0	7.545
Urban	4373	0.510	0.170	0.110	1
lnhgdp	4373	10.306	0.877	7.783	13.185
lnbuild	4373	15.737	1.246	12.018	19.168
lngfina	4373	14.274	1.139	10.406	18.241
lnfina	4373	15.999	1.332	12.983	20.513
Intech	4373	9.515	1.957	3.555	15.529
lneduc	4373	13.069	0.740	9.904	15.306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2汇报了宗族文化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未包含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第(2)列为纳入控制变量但未考虑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第(3)列为包含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显著为正,其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其经济意义分别为每万人口标准化下,宗族文化强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城市创业活力提升17.672、6.457和8.895个单位。由此可知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Enterp	Enterp	Enterp
Clan	17.672*** (1.567)	6.457*** (1.144)	8.895*** (1.365)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NO	NO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NO	YES
样本量	4373	4373	4373
R <sup>2</sup>	0.028	0.527	0.611

注:\*\*\*,\*\*,\*,分别表示10%, 5%, 1%的显著水平。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通常而言,城市创业活力以城市新创企业数量经城市人口标准化后得到。借鉴白俊红的做法,尝试用未经过标准化的城市新创企业数量加1取对数作为城市创业活力。<sup>[43]</sup>其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宗族文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从回归结果来看,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依然显著为

正,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lnEnterp	Enterp	Enterp	Enterp	Enterp
Clan	0.019*** (0.007)	8.431*** (1.307)	8.884*** (1.369)	4.649*** (1.053)	9.630*** (1.383)
Seacity					11.328*** (3.434)
Port					0.015*** (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NO	NO	NO
样本量	4373	4263	4301	4373	4373
R <sup>2</sup>	0.890	0.682	0.611	0.694	0.614

注:\*\*\*,\*\*,\*,分别表示10%, 5%, 1%的显著水平。

#### 2. 添加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为检验本文结论稳健性,考虑到样本中省级层面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动而变化的一些不可观测因素,从而对回归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克服这一问题,在回归中加入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其回归结果见表3第(2)列。从回归结果来看,宗族文化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本文结论稳健。

#### 3. 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样本相对于其他城市,其拥有着较大的经济和政治特殊性,城市在创业政策、创业创新环境、基础设施和金融信贷支持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本文对直辖市的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了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第(3)列。从回归结果来看,宗族文化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本文结论稳健。

#### 4. 数据缩尾处理

为确保结果不受样本极端值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上下1%水平缩尾处理,结果如表3第(4)列所示,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 5. 加入遗漏变量

考虑到本文中可能存在某些遗漏变量未被控制,使得回归结果不是宗族文化和城市创业活力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受到扰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相关关系。林理升和王晔倩的研究表明,位于沿海地区和周边具有港口的

城市具有较大的区位优势,借助于海运和水运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sup>[46]</sup>故城市位于海边和距离港口近有助于企业集聚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基于此,本文加入是否为沿海城市和距离港口最近距离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第(5)列,从中可以看出位于沿海地区和距离港口近有利于促进城市创业活力;同时,宗族文化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证明本文结论稳健。

### (三)内生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城市创业活力越强的地区,也可能促进宗族联结和开展宗族活动,进而提升宗族文化强度。因此,本文研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丁从明等<sup>[47]</sup>和孙程九<sup>[21]</sup>使用城市到朱熹书院的地理距离数据最小值作为工具变量用于缓解内生性问题,具体为各城市到岳麓书院、寒泉精舍和白鹿洞书院的球面距离并取其最小值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Distzhuxi)。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其在岳麓书院、寒泉精舍和白鹿洞书院任教期间,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些书院,朱熹完成了多部经典著作,例如《家礼》。<sup>[47]</sup>这些著作作为宗族组织的构建、管理与有序运转提供范式。受限于古代交通和通讯成本,靠近朱熹书院的地域会更早接纳并吸收朱熹思想,并且依托家族代际传递,理学伦理与宗族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由此,相较于偏远地区,距离朱熹书院越近的地区会发展出更为浓厚的宗族文化。同时,朱熹书院的选址具备随机性,是由古人和当时的社会地理环境决定,与现代的城市发展不直接相关。因此,宗族文化强度与朱熹书院距离关系密切,而与当代城市创业活力不直接相关,表现为较好的外生性,可以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同时,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为148.975(见表4),明显大于10;AR和Wald弱工具变量检验P值均小于5%,可以拒绝

原假设,从而证明朱熹书院距离满足作为本文工具变量条件,并不是弱工具变量。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距离朱熹书院距离越近的地区,宗族文化强度越强,反之越弱;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采用工具变量后,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Clan	Enterp
Clan		15.563** (7.549)
Distzhuxi	-0.112*** (0.009)	
AR weakiv test P-value	0.039	
Wald weakiv test P-value	0.039	
F值	148.975	
控制变量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4373	4373
R <sup>2</sup>	0.479	0.595

注:\*\*\*,\*\*,\*,分别表示10%, 5%, 1%的显著水平。

### (四)异质性检验

#### 1. 城市地理区位异质性

宗族和宗族文化在我国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其他地区,中国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宗族氛围更强。<sup>[48]</sup>为考察不同地理区位的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和参照秦岭—淮河线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南方城市与北方城市。回归结果为表5第(1) — (4)列,依次分别为东部城市(Enterp-E)、中西部城市(Enterp-MW)、南方城市(Enterp-S)和北方城市(Enterp-N)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在东部地区与南方地区对于城市创业活力显著为正,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对于城市创业活力影响并不明显,该结果通过CHOW检验,表明各组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原因可能在于宗族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从历史角度,一方面,宋朝时期经济中心南移且为躲避北方战乱,大批宗族迁移到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另一方面,宗族制度广泛存在于汉族社会中,而在古代,汉族人口主要集聚于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少数民族则更多居住在我国西部和边疆地区。从族谱数据角度,大多数的

族谱位于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较少,由此在中西部和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较弱,其对于城市创业活力影响不明显。因此,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存在地理区位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我国东部城市和南方城市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而在我国中西部城市和北方城市对于城市创业活力并无显著影响。

表5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Enterp-E	Enterp-MW	Enterp-S	Enterp-N	Enterp-HG	Enterp-LG
Clan	9.256*** (2.415)	1.239 (1.203)	9.264*** (1.606)	-4.537 (7.108)	136.906*** (14.476)	4.140*** (1.18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685	2688	2277	2096	621	3752
R <sup>2</sup>	0.660	0.611	0.668	0.642	0.769	0.577
CHOW检验	0.000		0.000		0.000	
p值	0.000		0.000		0.000	

注:\*,\*\*,\*\*\*分别表示10%, 5%, 1%的显著水平。

## 2. 城市等级异质性

在我国行政体制下,相较于普通城市,高等级城市在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上有显著优势,对于企业创办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为检验宗族文化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本文将城市样本中属于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视为高等级城市,其他城市为低等级城市。其回归结果见表5第(5)—(6)列,回归结果表明在高等级城市(Enterp-HG)和低等级城市(Enterp-LG)中,宗族文化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促进城市创业活力,从影响系数来看高等级城市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强于低等级城市,该结果通过CHOW检验,表明各组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可能是因为高等级城市往往集聚了更高密度的金融、法律、信息、人才等创业要素,其正式制度更加完善,宗族文化对于高等级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能够进一步放大,而在低等级城市宗族文化对创业活力的作用则可能表现得相对有限。因此,相较于低等级城市,宗族文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在高等级城市更为明显,即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在城市等级层面存在一定差异。

## (五) 机制检验

### 1. 提升城市人力资本

宗族文化内核的教育理念延续至今,影响宗族成员教育观念,促进地方教育氛围的形成,从而提升居民受教育水平,推动地方人力资本发展。因此,宗族文化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本文借鉴多数文献做法<sup>[49-50]</sup>,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CHC),即人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数×0+小学人口数×6+初中人口数×9+高中人口数×12+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16)/6岁及以上人口数。回归结果见表6第(1)列,可知宗族文化对于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宗族文化有利于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扩充了高素质创业者群体,其具备更强的风险识别能力、市场洞察力和管理素养显著提高了创业成功率。<sup>[51]</sup>此外,人力资本提升将有助于改善城市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状况,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得到改善,推动企业产品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sup>[34]</sup>由此,本文假设1得证,宗族文化可以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 2. 改善城市信用环境

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sup>[16](P22-26)</sup>,依托于儒家文化构建道德伦理制度,进而对于宗族成员形成行为规范。宗族文化内含道德约束与规范,可以营造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为城市创业提供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本文借鉴周小昶等<sup>[52]</sup>的做法,使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作为城市商业信用环境的评价指标,该指标反映了城市整体的信用水平,指数值越大,说明城市的信用环境和信用条件越好。回归结果见表6第(2)列,从中可知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商业信用水平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宗族文化可以改善城市信用环境。城市信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城市各主体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市场主体的投资风险和交易成本,培育良好的创业

土壤,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sup>[36]</sup>因此宗族文化可以通过改善城市信用环境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本文假设2得证。

表6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CHC	CEI	Cfps Privfinance
Clan	0.025*** (0.006)	0.121** (0.053)	0.025*** (0.0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4366	2418	940
R <sup>2</sup>	0.891	0.764	0.201

注:\*\*\*\*分别表示10%, 5%, 1%的显著水平。

### 3. 拓宽城市民间借贷

宗族文化能够促进宗族内部成员形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sup>[53]</sup>,加强宗族成员间信任程度,这将降低由于信任不足而带来的民间借贷交易成本。同时,宗族成员间彼此了解,可以降低民间借贷所面临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出现的可能性,从而更可能得到宗族内部融资。受限于无法得到城市层面民间借贷面板数据,且考虑到宗族文化的影响主要对象为普通家庭,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2010、2012、2014、2016四年数据中关于家庭在民间借贷的调查问题来反映城市民间借贷,根据调查期间存在民间借款的家庭数量占该地区调查样本数量的比值衡量地区民间借贷强度(Cfps\_Privfinance)。基于数据回归结果见表6第(3)列,从中可知宗族文化对于地区民间借贷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城市,其企业越有可能从民间渠道获取贷款,民间借贷渠道的拓宽,将能够作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有效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填补企业资金缺口,而且这种效应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作用更大。<sup>[54]</sup>据此本文假设3得证,宗族文化可以通过拓宽城市民间借贷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 六、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城市创业活力在正式制度缺位中表现

出强劲韧性,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值得进行更为深入探究。宗族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典型表征,本文以宗族文化为切入,系统检验其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宗族文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力,经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存在鲜明异质性,具体表现在我国东部和南方城市表现突出,而在其他区域则不明显;同时,高等级城市所受影响强于低等级城市。机制分析表明,宗族文化可以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改善城市信用环境和拓宽城市民间借贷影响城市创业活力。

### (二) 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上述结论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传承悠久,历经多次社会动荡而不间断,对于中国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本文研究揭示了宗族文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效应。为此,须正视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定文化自信,发挥文化软实力功能,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居民行为,实现城市文化与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第二,宗族文化内核存在许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方面,其内涵的家国情怀、成员互助、人才培养和诚实守信等思想,促进宗族成员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对于宗族而言,有助于宗族的经久不衰;对于社会而言,有助于社会长治久安和稳定。本文研究表明,一方面宗族文化的教育观念,有利于营造教育氛围,推动地方人力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宗族文化促进城市商业信用水平,宗族成员对于信用的认识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降低企业面临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可以通过弘扬宗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鼓励宗族文化中有关教育和诚信的传承,营造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第三,宗族文化促进成员间构建宗族关系网络,加强彼此信任程度,促进宗族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信息流通。本文研究表明宗族文化能够拓宽城市民间借贷,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为创业活动和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稳健的融资保障。因此,辩证看待民间借贷渠道,鼓励和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利用宗族文化中的互助合作精神,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融资选择。同时,促进银行与宗族企业之间的合作,利用宗族网络的信用信息,建立信用担保体系,降低企业融资门槛,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论证了传统宗族文化与城市创业活力之间的关系,但依旧存在一定局限性,以下为本文的不足与后续可能的研究重点。第一,本文异质性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高等级城市创业活力的正向效应高于低等级城市,其可能的原因是在正式制度更完备的城市,宗族文化效应愈发能被正式制度放大,未来对此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第二,宗族文化影响创业活力的机制并没有完全揭示,本文从人力资本、信用环境和民间融资三个方面,剖析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但宗族文化传承悠久,其文化内核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剖析,宗族网络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积极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挖掘。第三,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各城市聚集着反映不同宗族文化强度影响下的居民,流动人口背后的宗族文化对城市经济活动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1]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10):99-108.
- [2]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57-116.
- [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87-99,207.
- [4]白重恩,谢长泰,宋铮,等.“特事特办”:中国经济增

长的非正式制度基础[M]//吴敬琏.比较.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 [5]刘愿,吴亚婷,魏东霞.乡土中国的城市化——宗族文化如何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J].学术月刊,2024,56(10):64-76.
- [6]潘越,宁博,纪翔阁,等.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7):94-110.
- [7]陈志,冯苑,吴蒙.知识产权保护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25(7):110-119.
- [8]李晓龙,刘明宇.银行业竞争能否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基于信贷可得性与信贷配置效率的双重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4,36(6):124-136.
- [9]刘明慧,张孟瑶.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J].财经论丛,2024(10):48-58.
- [10]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管理世界,2013(3):69-81,187-188.
- [11]袁媛,王一晟,刘彬.宗族文化是否影响企业并购决策?——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证据[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5):136-152.
- [12]GREIF A, TABELLINI G. The clan and the corporation: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7, 45(1): 1-35.
- [13]CHEN N, YANG H. From rural to urban: Clan, urbanization and trust[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 85: 102172.
- [14]NUNN, NATHAN.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J].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2012, 27(S1): S108-S126.
- [15]YANG H, ZHANG X. Persistence of culture: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of origin contributes to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3, 61(3): 1179-1204.
- [1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7]潘越,翁若宇,纪翔阁,等.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J].管理世界,2019,35(7):116-135,203-204.
- [18]燕红忠,高原.宗族网络、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治理——以清代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5(1):92-110.
- [19]张博,范辰辰.宗族文化与微型金融机构发展: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J].经济评论,2019(6):134-147.
- [20]LI C, WANG C, XUE C. Clan cult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4, 83: 102229.

- [21]孙程九. 历史的遗产——传统宗族文化对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9): 193-212.
- [22]石有为, 郝少博.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创业效应——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7(5): 1-12.
- [23]吉赞, 王亚男, 王帅, 等. 公共数据开放与创业活跃度——来自工商企业注册数据的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 2025(3): 36-51.
- [24]徐莹莹, 刘钰, 柳文婷.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J]. 价值工程, 2025, 44(3): 85-88.
- [25]康茂楠, 毛凯林, 任静. 数字政府建设与创业活跃度: 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1(3): 75-93.
- [26]GEORGE, GERARD, ZAHRA, et al. Cul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26(4): 5-8.
- [27]郭云南, 张琳弋, 姚洋. 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J]. 金融研究, 2013(9): 136-149.
- [28]曹增栋. 宗族网络对农村居民创业表现的双重影响——促进与限制因素的解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6(2): 29-42.
- [29]徐国长, 陈万明, 马永远. 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影响机制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4, 36(4): 75-87.
- [30]马俊峰, 徐子尧. 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J]. 世界经济文汇, 2023(4): 58-82.
- [31]盛亦男, 尚佳佳, 郑浩冉. 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城市创业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23, 47(4): 114-128.
- [32]江小角.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J]. 安徽史学, 2013(5): 103-107, 124.
- [33]费孝通, 吴晗. 皇权与绅权[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 [34]张云, 江曼琦. 人力资本对提升城市创新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3): 115-121, 140.
- [35]黄卓群.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机制: 事前甄别还是失信惩戒——来自于创业投资的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 41(1): 27-41.
- [36]孙晋云, 白俊红, 张艺璇. 社会信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3): 75-93.
- [37]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38]CULL R, LI W, SUN B, et al. Government connec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 32: 271-294.
- [39]胡金焱, 袁力. 宗族网络对家庭民间金融参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J]. 财贸经济, 2017, 38(6): 33-48.
- [40]魏哲, 夏帅, 张斌.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创业活跃度[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6(7): 16-28.
- [41]曾婧婧, 温永林. 政府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国家创业型城市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管理, 2021, 43(4): 55-70.
- [42]何雨可, 牛耕, 逯建, 等. 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1): 47-66.
- [43]白俊红, 张艺璇, 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6): 61-78.
- [44]梁若冰, 任伟聪. 宗族组织、信贷约束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大学扩招”的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 2023(2): 213-226.
- [45]刘冲, 刘莉亚, 李庆宸. “排斥”还是“包容”: 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银行发展[J]. 经济研究, 2021, 56(4): 110-125.
- [46]林理升, 王晔倩. 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J]. 经济研究, 2006(3): 115-125.
- [47]丁从明, 樊茜, 刘自敏. 传统宗族文化提升现代农业生产效率: 效应与机理[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8): 88-106.
- [48]ZHANG C.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0, 48(1): 100-123.
- [49]刘长庚, 刘林志.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省际差异及其成因[J]. 经济地理, 2024, 44(10): 12-23.
- [50]张靖凯, 陈军, 邢炜.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路径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动态QCA分析[J]. 软科学, 2025, 39(2): 32-40.
- [51]ACS Z J, SZERB L.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7, 28(2): 109-122.
- [52]周小昶, 赵仁杰, 曾艺. 社会信用环境与企业专业化[J]. 财贸经济, 2024, 45(8): 121-136.
- [53]王陈豪, 王轶, 李红波. 宗族文化与企业并购收益[J]. 会计研究, 2020(2): 101-116.
- [54]马光荣, 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 2011, 46(3): 83-94.

##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lan Culture o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47 Cities in China

ZHANG Hongzho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recorded an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of over ten million new market entities, with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demonstrating considerable resilience despite the absence of formal institutions. The critical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his context cannot be overlooked, and traditional clan culture serves as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Taking clan culture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study selects 247 cities from 2003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construct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lan culture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l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including endogeneity tests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robustness checks such as replac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is facilitating effect exhibits pronounced heterogeneity: it is particularly salient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cities but insignificant in other regions; it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both high-tier and low-tier cities, with a stronger effect observed in the former.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mphasis on education embedded in clan culture affects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y enhancing urban human capital; the value placed on trustworthiness improves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y ameliorating the urban credit environment; and clan kinship networks influen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y broadening access to urban private lending.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clan culture should be dialectically strengthened, promoting those elements compatible with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oncepts such as educational focus, integr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the social capital inherent in clan culture should be harnessed to invigorate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Keywords:** clan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re; kinship networks;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

(上接第37页)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V Huiqin, HUANG Zizhao & CHEN Siji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ross-border employment and job mobility within the region have been increasing. The complexity of cross-border labor practices among the three regions—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along with th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substantive labor laws and the judicial resolution of cross-border labor disputes, which faces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and legal applicability barriers, have made mediation an optimal pathway for resolving such disputes. The three regions have explo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border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platforms, collaborative mediation models involving mediators from all three areas, and the signing of mediation cooperation agreements.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insufficient alignment of mediation rules, fragmented mediation cooperation, and a lack of mediator professionalism. Aligning mediation rules, implementing soft law governance for mediati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ng mediation resources are strategic measures for building a cross-border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mot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ross-border employment; labor disputes; mediation cooperation; rules coordination